

笔会

“只许一人知”

——怀念园先生周策纵教授

罗青

诗画论交忘童年

一九四九年已还，三湘才俊，寓台甚多，我有机会亲炙受教的先生有李渔叔、周策纵、袁德星（楚戈）三位，其中在学术上，惠我最多的是策公先生。

邵阳周策纵教授（1916—2007），博闻强记，多艺多才，学贯中西，著作等身，任职中外上庠，桃李遍布天下，教研之余，嗜诗、书、画。每次访台，必至敦化南路寒舍“水墨斋”，索观新作，畅谈诗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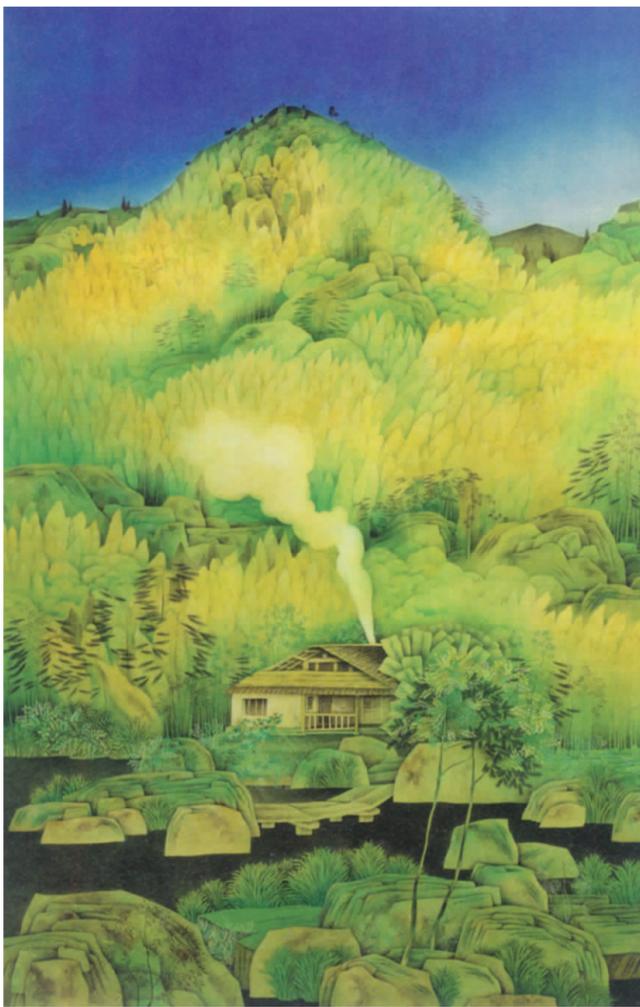
丁丑秋深，周末午后，先生于台北参加学术会议之隙，翩然莅临寒斋，品茗小坐，谈文论艺。我适有对联新稿，以冬心体书担当和尚赠徐霞客语：“何必天下识，只许一人知”，遂挂挂素壁，谨求雅教。

先生凝视良久，未发一言。备完茶点的我，正待移席请益。先生突然伸手一指，疑间道：“怎么‘一’字右边，多了一点污墨。或是装池之失？”

我大惊懊恼，言此昨夜匆匆匆取回，未及细审，当初送裱时，并无脏污。当是裱画师傅，湿拓上板后，意外遭损，污点当在纸面，吃墨必然不深，或可用刀片刮去。于是箭步上前，凑近细查，原来是大黑蚊一只，叮在“一”字之上，宛如墨点。顿时破忱转喜，身形一矮，暗举双掌上前，正拟喊打。

“住手，住手，不要打！”不料先生在身后大呼，“这正好证明，你的字，有血有肉。”

我闻言顺势合掌，转身笑道：“真是妙语天下，可入《世说新语》。”先生亦颌首大笑，端茶闻香，低首品茗。



笔会

竹山清音图（国画）

刘毅

对襟衣

陈益

冠服衣襟，既是生活方式，也是文化的象征。读顾炎武《日知录》，发现卷二十八中有多则谈及。他说，五六十年间我看到的服饰变化已经很多，所以记录自己所闻，以视后人。其中之一是《豫章漫钞》：“今人所戴小帽以六瓣合缝，下缀以檐如檐。闻宪副谓予言，亦太祖所制，若曰‘六合一统’云尔。杨维桢廉夫以方巾见太祖，问其制，对曰：‘四方平定巾。’上喜，令士人皆得戴之。商文毅自编民，亦以此巾见。”杨维桢所戴的方巾，有四方平定的含意，受到明太祖喜欢，得以推广、流行。顾炎武又引《太康县志》所载，比较自洪武经弘治、正德、嘉靖历代，服饰时尚的流变，似乎只体现在冠帽尺寸、衣衫高低、裙褶多少上，没有出现根本的异常。

然而在《对襟衣》一则，顾炎武引《大祖实录》载：“洪武二十六年三月，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对襟衣。惟骑马许服，以便于乘马故也。其不应服而服者罪之。”对襟衣，跟宽松飘逸的袍服不一样，便于骑马。尽管明洪武年间禁止穿着，甚至问罪于不该穿者，但是到了顾炎武生活的明末，仍然以罩甲、蔽甲、披袄、背子的名称存在，由不同的人穿着。形制与对襟衣相仿，两襟相对，中间系纽。

上古时代，汉人所穿上衣大多是交领斜襟。中原人崇尚右，往往是衣襟右

泰山，游过云南石林，上过丽江雪山，访过张家界、九寨沟，就是无缘一探黄山，至于写黄山的诗，也始终未见。如今先生墓木已拱，而我也始终没机会向他描述后来我初登黄山摄影的惊喜！

夜宿弃园书灾中

在没有电子信件的时代，手书信函，仍是最方便的通讯方式。我留美归国后，在辅仁大学任教，与周策纵先生时有书信往返，内容多半与诗画及学术研讨有关。先生乃谦谦君子，与晚辈交，从不倚老卖老，诚恳而无虚文，与梁实秋、台静农老辈诸贤作风一同。

周先生每岁必以大红卡纸，自制贺年卡，并系绝句或律诗一首，抒发心境，感慨世情，全以毛笔小楷书之，有喜气、庄重、亲切，三者俱到之妙。因多次搬家的关系，现在手边仅存一九八四年至一九九六年的贺卡，兹选八四年七月一首，以窥一斑，这一年先生六十八岁：

客里残冬暖旧盟，又随风雪问安平；年年日月成儿戏，事事烟云怨世情；叶落巢生思鸟聚，庭空室远觉邻清；抛书卧听檐冰裂，仓促人闲得晚晴。

其中“儿戏、世情”，“冰裂、晚晴”之句，工稳中有新意，烦恼中有安慰，可谓异域浮生写照。至于他的信札诗稿，现在可以找到的，以一九八五年那封信为最早，也最能显示他提拔后进的爱才之心：

多时未通音问，只因许久找不到你的通讯处，所以耽擱了。现在只好直寄到学校罢，也许你还在那里。但是时时想到你的。

在报上常常读到大作，很高兴。Joe Cutter 现在本系教书，在他夫妇家里见到你画给他们的画，比过去画的又多了许多泼辣的兴致了。

四月上旬，台北的古典文学会议，我可能出席。也许我们又能见到面。

信中除了殷殷怀念之意外，对我的诗画创作，有温情的鼓励与深切的期许。行文之间，用了许多“罢”与“了”字，颇有五四遗风，让读的人觉得古风盎然。

一九九三年，我获得富尔布莱特艺术家奖，赴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客座，周先生闻讯十分高兴，来信说，他现在哈佛客座，而我则在有美中哈佛美誉的华大“挂单”，应该有机会一晤。三个月后，机会果然来了，威斯康星大学之乱而殉国，名气之大，直逼“四王”，号称“四王汤羹”。尤其是戴熙，真迹十不得一，珍贵异常。能得到这样的……谈着谈着，不免打起哈欠来。

周先生见状，只好当场立断说：我女儿今年到东岸上大学，围房空着，你就睡那一间吧。我推门进去，只见书桌、椅子上，也已经堆满了书，不过，所幸尚未波及床铺，安睡一晚，当无问题。我回头望了望客厅的长沙发，放心把行李提了进去。



罗青书联

正好彻夜长谈。是夜，真是群贤毕至，俊彦云集。连思想史大师林毓生先生都被约了来。亏了我的学生林惠玲正好在威大攻读比较文学，没有她忙前忙后，打理一切，届时大家可能连站着说话的地方都没有。原来周先生的客厅虽然很大，但因书堆成山，必须要有人事先清理，不然根本坐不下这么多人。

演讲会后，大家讨论热烈，结束时已是深夜了，周先生起身为我安排卧房。他先到客房一看，里面床上地下早已堆满了书，连门推开都有困难，更遑论住人了。他想了想，到我卧室去看看有没有办法，我太太在外地工作，平时都不住家里。周先生的主卧室，也是天下奇观，一进门，只见地毯上都是书，只留一条小径，通往双人床，床上一半，也高高堆满了书，只留下一窝一人睡卧的痕迹。卧室窗边好像还有一张单人床，但也被书籍堆满，堆到看不出床形的地步。

忽然，他走到床边，伸手到床下摸索了一阵子，抽出了几团团扇册页，拿来给我看，说你来鉴定鉴定，这些都是我在弄《红楼梦鼻烟壶考》一文时，顺便搜集到的，也不知道对不对。

我定神一看，第一张是张问陶的书法。周先生笑着说：“你藏有他的行草对联，我这是他的汉隶斗方，怎么样？少见罢？”我好奇问道：“船山的隶书，确实不多，我另藏有他的山水花卉，题字落款，也都是行草。他与高鹗为顺天乡试同年举人，我那一套改七岁画的《红楼梦图咏》，上有他的题诗，也是行书。船山算是研究红学的鼻祖，百来年后，今夜能在纸上相逢，亦是有缘。”

其他两张画，都是精品小景山水，一幅是张之万的，另一是戴用柏，笔墨全是文节公一路，清雅疏淡，为画中逸品。子青、文节，当时有“北张南戴”之目，而用柏是文节从子，尽得家学。晚清画家，雨生、醇士二人，因太平天国之乱而殉国，名气之大，直逼“四王”，号称“四王汤羹”。尤其是戴熙，真迹十不得一，珍贵异常。能得到这样的……谈着谈着，不免打起哈欠来。

周先生见状，只好当场立断说：我女儿今年到东岸上大学，围房空着，你就睡那一间吧。我推门进去，只见书桌、椅子上，也已经堆满了书，不过，所幸尚未波及床铺，安睡一晚，当无问题。我回头望了望客厅的长沙发，放心把行李提了进去。

早餐对坐不见面

夜宿“弃园”，一宵无语。早上起来，竟然已近十点，漱洗完毕，连忙出得房门，只见周先生早已在客厅阅报。他起身引我进厨房说，这里不比台北，没有烧饼油条，我一般早餐简单，煎一个蛋，加起士肉片吐司，做三明治吃，配上一杯牛奶，一杯橙汁，一个苹果，就算完事。我忙说足够足够，再多也吃不下了。

周先生煎完荷包蛋，往两只大瓷盘中一放，此时吐司也已烤好，肉片、起士、牛奶、橙汁，都是冰箱里现成的，正准备上桌，却发现餐桌上，堆满了半个人的书，盘子实在无处可放。

周先生笑着解释说，我每天早上，都是站着吃早餐，今天你来，可以把座位面前的书，暂时搬放在地上，清一清，大家坐着慢慢慢慢慢慢。

我依言搬下了两落书，放好了餐盘与牛奶、果汁，至于苹果，就只好放在旁边的书堆上了。

我们各自坐下，一面吃着早餐，一面聊着，虽然看不见对方，但是大口咬吐司的声音，还是清晰可闻。

久而久之，忽然有一种错觉，好像听到两堆书在对话，声音似近实远，时近时远，穿越时空，似真又幻。

好像此刻正在书房写作的我，在书籍的环绕下，仍然依稀能听到先生爽朗的笑声，从书中传来。

噢，一次难忘的早餐！

戒石

虞云国

（1190）所立《戒石铭》，仅将“上天”改作“上苍”，足见宋金虽是敌国，在为官要求与施政理念上并无二致趋同；也说明小说中蔡福将御制铭文的“上天难欺”引作“上苍难欺”，应确有所本的。

作为制度性规定，自宋太宗朝起，全国州县衙门无不立有《戒石铭》。据宋高宗追忆，他在北宋末年“所历郡县，其戒石多置栏槛，植以草花”，已然成为全国官衙的标配；但他也不得不承认，“为守为令者，鲜有知戒石之所谓也”，只是摆设而已。由于戒石只是用来装点官衙的门面，上至朝廷“六贼”，下至州县长吏，民脂民膏尽入囊中，欺天虐民无所不为，这才“乱由上作”，官逼民反，构成了小说的大背景。宋江起事虽然失败，北宋却走到了尽头。

绍兴二年（1132），南宋建立第六个年头，宋高宗号称“中兴之主”，“拨乱爱民，规祖宗”的旗号还要标榜的，便亲以“御笔钩临黄庭坚书《戒石铭》”，再颁天下，命州县长吏“刻之庭石，置之座右，以为晨夕之戒”。他在政治上最会作秀，颁赐黄庭坚墨本时，还下诏书说：

近得黄庭坚所书太宗皇帝御制《戒石铭》。恭味旨意，是使民于今不厌宋德也。可令摹勒庭坚所书，颁降天下。非惟刻诸庭石，且令置之座右，为晨夕之念，岂曰小补之哉！

“不厭宋德”云云，无非要求子民百姓在这存亡之秋仍应念叨皇家的恩德好处。天子作秀，大臣跟庙祝四行，却是有根有据的，小说后面也有照应。第六十二回说，管家李固与主母勾搭，将卢俊义告发，打入大牢，便去抄押牢节级蔡福，双方有段对话：

李固道：“奸不厮瞒，俏不厮欺，小人的事，都在节级肚里。今夜晚间，只要光前绝后。无甚孝顺，五十两蒜条金在此，送与节级。厅上官吏，小人自去打点。”

蔡福笑道：“你不见正厅戒石上，刻着‘下民易虐，上苍难欺’。你那嘴心味已勾当，怕我不知！你又占了他家私，谋了他老婆，如今把五十两金子与我，结果了他性命；日后提刑官下马，我吃不的这等官司。”

蔡福的报价是李固出价的十倍，这桩买卖才算成交。其他细节且不管它，蔡福随口引用的也正是“御制四行”中的两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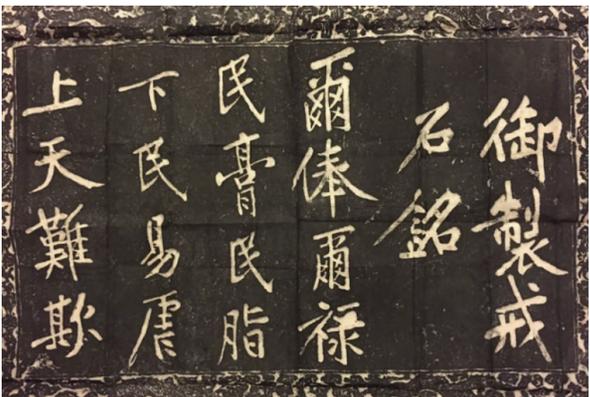
蔡福说的八字，出自宋太宗御制《戒石铭》。《容斋随笔·戒石铭》说：

“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；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。”太宗皇帝书此，以赐郡国，立于厅事之南，谓之《戒石铭》。

严格说来，这《戒石铭》的著作权应归五代后蜀主孟昶所有。在洪迈看来，后蜀主孟昶“区区爱民之心，在五季诸僭伪之君为可称也”，他在位时曾颁亲撰的《令箴》：

朕念赤子，吁食育衣。言之令长，抚养惠绥。政存三异，道在七丝。驱鸡为理，留犊为规。宽猛得所，风俗可移。无令侵削，无使疮痍。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。赋舆是切，军国是资。朕之贵罚，固不输时。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。为民父母，莫不仁慈。勉尔为戒，体朕深思。

这篇官箴共二十四句九十六字，颇嫌冗长，不便记忆；再如“三异”、“七丝”、“驱鸡”、“留犊”之类，大掉书袋，难以理解。经宋太宗夺胎换骨，删冗汰繁，大刀阔斧，截取四句，确如洪迈点赞的“词简理尽”。宋太宗将孟昶处拿来的十六字颁行全国，命州县衙门都立石为戒。这位皇帝颇懂书道，所谓“御制”或许即出其手。另据《贵耳集》说，宋哲宗在位，也曾“书《戒石铭》赐郡国”，但他的事迹与宋太宗同样未传世。据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，现存最早的《戒石铭》碑刻原在湖南道县，乃出自宋哲宗时大书家黄庭坚的手笔。据缪荃孙艺风堂收藏的戒石拓片（见下图），除《太宗皇帝御制》碑额与《御制戒石铭》题名外，正文四句即分四行直书，与《水浒传》所“上刻御制四行”若合符节。山西芮城县博物馆藏有金朝明昌元年



出自黄庭坚手笔的《戒石铭》



「文汇报」
微信二维码